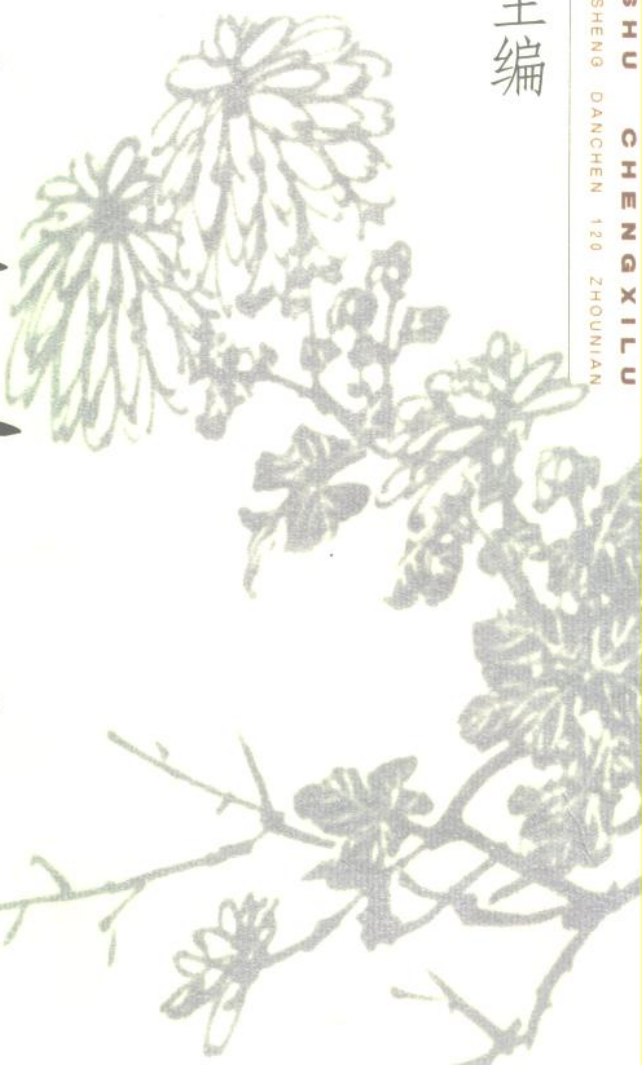


LIYUN XUESHU CHENGXILU
JINIAN CHENYUAN XIANSHENG DANCHEN 120 ZHOUNIAN

龚书铎 主编

励耘学术承习录



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励耘学术承习录

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

龚书铎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北京

2t37/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龚书铎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1
ISBN 7-303-05606-8

I. 励… II. 龚… III. 陈垣-纪念文集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51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0.375 字数:298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6.00 元



陈垣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门前(1962年9月20日)



陈垣在励耘书屋（1961年5月25日）

前 言

今年是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们编辑这本学术论文集，以表达我们深情的纪念。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陈先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以其爱国主义的巨大热忱，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对我国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总结和改造，以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研究为阵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陈垣先生勤奋治学的一生，是精益求精、开拓进取的一生。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治学的几次变化：“九·一八”以前重钱大昕之学；“九·一八”以后改为顾炎武经世之学，注意事功，进而又讲全祖望之学，激发故国情思；解放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希望一切从头学起。按照这样的概括，他的史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1917 年至 1931 年之间，他在继承钱大昕等乾嘉考据学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取材广博，综合分析和形成专学体系，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考证学。此期他通过《元也里可温教考》等“古教四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以及《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第二阶段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到八年抗战期间，陈垣先生身处沦陷区，坚贞不屈，拒绝敌伪的劝诱，他在讲台上讲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此期他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三书”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方面是他的历史考证在宗教史领域的新创获，一方面则表达了

他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的抗日救国思想。尤其是他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更充分反映了他的爱国情操，这部史考和史论紧密结合的杰作，标志陈先生的史学成就达到新的高度。第三阶段是解放后的20余年，他的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1949年5月11日，他发表了《给胡适之的一封信》，阐述了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愿望和体会，他不顾年高，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他耕耘不息，解放后依然撰写了40多篇史学论文，主持了整理《册府元龟》和新旧《五代史》的大型项目。陈先生的史学研究，为近现代历史考证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典范；他的卓越成就，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他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他所撰写的20部专著和200余篇论文成为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在跨入21世纪之际，我们纪念陈垣先生，不仅要学习和继承他的史学成就，而且要继承和弘扬他身上所体现出的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在学术上严谨专精、创新进取的“励耘精神”。

陈垣先生的一生，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他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不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新旧中国的历史鼎革。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多方摸索救国之路，早年参加反清反帝的民主斗争，中年期望以教育救国，最终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归宿，在近80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坦诚地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降低身分’，实际上一个人能向真理投降，是最光荣的事情。”“因此，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这种勇于否定旧我、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人类文明史上许多大师级学者所共有的品格，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有些学术史的文章在大力推扬所谓“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同时，对陈垣先生信仰马列、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做法颇置微辞，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殊不知，他们一边在强调学术、思想的自由，一边恰恰剥夺了别人服膺马列、接受真理的自由。况且，学术本来就没有什么超现实、超政治的自由。至于境外某些文人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以所谓“投共”、“陷共”等等的说法，对陈先生的贬

低之词，更是无稽之谈了。

陈先生一生始终怀抱赤诚的爱国之心，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励耘精神”的根本出发点。从政治上讲，正因为陈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他晚年能够坚持迎接解放，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郑重选择。从学术上讲，爱国主义也是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的源头活水。他一直把争取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把汉学中心从巴黎、东京夺回中国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激励自己和学生努力工作，并终以丰硕的学术成果饮誉海内外。抗日战争期间，强烈的爱国激情促使他将史学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艰苦创作了“宗教三书”和《通鉴胡注表微》等专著，以古喻今，斥敌斥伪，从而把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解放后，陈先生提倡学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他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他晚年将自己大量时间和精力投注到祖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之中，把自己渊博的学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这是他晚年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目前，学术界有些人对陈垣先生晚年的史学成就认识不足，有的人甚至连翻检一下陈先生的著述目录也没有，就断言，1949年以后陈垣“基本上没有在史学方面再撰新著”。这不仅无视陈先生解放以后在全国性史学建设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而且也无视他解放后所撰写的40多篇史学论文。这种以非学术方法所做的学术评论，实在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我们学习陈垣先生，还要学习他在治学上实事求是，谦虚谨严，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学风。陈先生治学，从来一丝不苟。他搜集材料，务求竭泽而渔；立论评说，务求言之有据，提出新见；著书撰文，务求言简意赅，不尚空谈。他曾在历史研究所二所的学术会议上专门谈学术论文的问题。他说：“发表文章应当闲话不说，或者少说。文章不怕长，但要有内容，没废话，让人看得懂。”“言之无物的文章最好少写，看起来太费眼力，更重要是太费时间。”“还有批评文章，也应做到以理服人。”他提出：“我以为，发表文章，最低要求应当：1. 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2. 话要说明白，使人看得懂；3. 闲话不说，或

者少说。”^①陈先生治学，谦虚谨慎，他发表文章前，总要再三修改，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文章发表后，对别人所提意见，更是从善如流，虚心接受。认真学习陈垣先生的学风，对于克服我们学术界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实事求是、任意褒贬；或东拼西凑，急于求成；或无视学术规范，抄袭剽窃的不良学风，将大有裨益。

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将联合举行陈垣先生学术研讨会。本文集所收论文，有一部分即由北京师大师生和历史所的研究人员所撰写；其他部分则由各地学者撰稿。论文的作者有亲身聆听过陈先生教诲的七八十岁的老学者，也有在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内容集中研究陈垣先生的学术和思想，或探讨他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或研究他的一部史学专著，或论述他的史学方法，也有关于他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内容广泛，各具特色，皆为精心之作。在此，我们谨向不辞辛劳、慷慨赐稿的各位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排，按收稿前后序列。

愿我们通过对陈垣先生学术的研究，继承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发扬他倡导的优良学风，努力推动中国历史学在 21 世纪的繁荣和进步。

① 陈垣：《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光明日报》1961 年 3 月 16 日。

目 录

前言	(1)
《旧约》三史异文考	陈 垣 (1)
读《通鉴胡注表微》	李 瑚 (9)
近代中国医史奠基人陈垣在广州	刘泽生 (31)
寓“心史”于宗教史	郭预衡 (41)
陈垣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	陈高华 (43)
《清儒学案》杂考	陈祖武 (58)
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	乔治忠 刘 馨 (82)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读后——陈老的史学思想 及史学方法探微	邓 瑞 (90)
校勘四法与校勘实践	裴汝诚 (113)
陈垣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读《南宋初河北新 道教考》书后	来可泓 (120)
陈援庵先生的宗教史观	牛润珍 (128)
励耘书屋受业心得	刘翰屏 (150)
略论《通鉴胡注表微》	邱瑞中 (157)
陈垣先生与中国火祆教研究	林悟殊 (170)

重读《陈垣史源学杂文》——缅怀陈垣老师

..... 来新夏 (180)

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 (Paul Pelliot)

的交往为中心 桑 兵 (185)

陈垣先生的教育成就与教学方法初探 汝企和 (203)

陈垣教育思想探隐 郭齐家 (214)

陈垣与胡适 陈智超 (226)

陈垣摩尼教研究探析 张小贵 (268)

浅谈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实习课” 张其凡 (286)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说陈垣先生写文章

..... 许殿才 (291)

陈垣与傅斯年史学思想异同论 李 泉 江心力 (305)

《旧约》三史异文考

陈 垣

余于基督教，所知至浅，所见又颇异于时贤，故于义理方面，不欲多所论列，惟于考订方面，略有致力。尝以乾嘉诸儒治史之法，治《旧、新约》，有所获辄随手记录，八年以来，遂积巨帙。同志中每怂恿发表，以非专业，恐貽燕石之诮，未敢率尔也。今因《真理周刊》出版，义不可无一言，特以《〈旧约〉三史异文考》寄之。

三史者，《撒母耳记》以下六卷也。三史记载，时有异同，其显而易见者为世系及数目之属。世系如《历代志上》七章与八章所记之便雅悯后裔，八章与九章所记之扫罗后裔，名氏世次，每每歧异。余于此剖析原文，演成图谱，所以便比勘。然因排印不易，兹特舍去，仅取其同记一事而数目不同者著于篇。（《撒母耳记》简称《撒》，《列王纪》简称《王》，《历代志》简称《代》）

《代上》七章六节，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结、耶叠三人；
《代上》八章一、二节，便雅悯生长子比拉，次子亚实别，三子亚哈拉，四子挪哈，五子拉法。

既曰三子，又有五子，何耶？据《创世记》四十六章二十一节，便雅悯且有十子也。

《撒上》六章十九节，伯示麦人擅观主底约匣，主击杀了他们五万零七十人，百姓因主大大杀他们，就甚哀哭。

伯示麦一小村耳，能容五万余人乎？是非有异文，特对于其数目

有异义，故及之。

《撒下》十章六节，亚扪人见自己在大卫那里有了臭名，就差遣人去在伯利哈的亚兰人中，和锁巴的亚兰人中，招募了步兵二万，又招募了属玛迦王的人一千，多伯人一万二千；《代上》十九章六、七节，亚扪人见自己在大卫那里有了臭名，哈嫩和亚扪人遂将一千他连得银子交给他们，差遣他们在两河间、亚兰马迦和锁巴去雇觅战车和马兵，就雇觅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一曰步兵二万，人一万三千；一曰战车三万二千辆，同乎异乎？

《撒下》十章十八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走，大卫毁灭了亚兰人底战车七百辆、马兵四万，又杀死亚兰王的将军朔巴；《代上》十九章十八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遁，大卫毁灭了亚兰人的战车七千辆，杀死步兵四万，又杀死军长朔法。

战车七百辆与七千辆不同，马兵与步兵又异。

《撒下》八章四节，大卫擒获他底马兵一千七百，步兵二万；《代上》十八章四节，大卫擒获他的战车一千辆，马兵七千，步兵二万。

马兵一千七百与战车一千辆、马兵七千，数目实相悬绝。

《撒下》二十三章八节，跟从大卫的勇士，他们名记在下面，亚扪人约朔巴设，他是诸将的统领，他一时将枪一轮，杀死了八百人；《代上》十一章十一节，大卫所有的勇士，他们的数目记在下面：哈革摩尼的儿子雅朔班，是诸将的首领，他一时将枪一轮就杀死三百人。

八百人与三百人不同，统领之人名亦异。

《撒下》二十四章九节，约押将民数告诉王，以色列能拔刀的武士共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代上》二十一章五节，约押就将民的数目告诉王，以色列人能出兵的，共有一百一十万，犹大人能出兵的共有四十七万。

八十万与一百一十万，五十万与四十七万，皆不同。其尤不同者，则此两章之一节，并附见如下：

《撒下》二十四章一节，主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感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底数目；《代上》二十一章一节，撒但要害以色列人，就诱惑大卫数点以色列人。

主与撒但不两立，然一则曰主，一则曰撒但，至可异也。

《撒下》二十四章十三节，迦得到大卫面前对他说：或在你国中有七年饥荒？或三个月你在敌人面前逃跑，敌人追赶你？或在你国中有三日瘟疫？《代上》二十一章十一、十二节，迦得遂来见大卫，对他说，主说你要挑选，或饥荒三年，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瘟疫三日。

饥荒七年、三年不同。

《撒下》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大卫就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禾场并牛，在那里为主筑了一座祭台；《代上》二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于是大卫平了六百舍客勒金子，给了阿耳楠，买了那块地，在那里为主筑了一座祭台。

五十舍客勒与六百舍客勒，相差至十余倍，银子与金子又不同，价

目少者并多买有牛也。

《王上》五章十一节，所罗门给希兰麦子二万歌珥，清油二十歌珥，作他家的食用，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希兰；《代下》二章十节，我必赐给他们嘉麦二万柯珥，大麦二万柯珥，酒二万罢特，油二万罢特。

歌珥以量定质，罢特以量流质，二十歌珥是否与二万罢特相同，恐相差远矣。

《王上》五章十五、十六节，所罗门用七万人抬扛材料，用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此外所罗门又用三千三百督工的监管作工的人；《代下》二章二节，所罗门就挑募七万人扛抬，八万人上山凿石头，三千六百人督工；又《代下》二章十七、十八节，这时所罗门又计数他们，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人，使七万人扛抬，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三千六百人监督工作。

监督工作者三千三百人，与三千六百人不同。

《王上》六章二节，所罗门为主所建的殿，深六十尺，宽二十尺，高三十尺；《代下》三章四节，殿前底廊檐，长二十尺与殿宽一样，高一百二十尺。

殿高不过三十尺，廊檐高至一百二十尺，其然乎？

《王上》七章十五、十六节，他制作两根铜柱，每根高十八尺，围十二尺，又用铜制作两个柱顶，放在柱上，每一柱顶高五尺；《代下》三章十五节，在殿前作了两根柱子，高三十五尺，每一柱头高五尺。

一曰高十八尺，一曰高三十五尺，大不同矣。

《王上》七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又铸一铜海，在海边之下，四围有野瓜样式环绕，可以容二千罢特；《代下》四章二至五节，又制造一铜海，在海边下，四围有牛像环绕，可以容三千罢特。

二千罢特与三千罢特不同；海边四围有野瓜样环绕，与有牛像环绕又不同。

《王上》九章二十三节，所罗门有五百五十督工底人，监管作工底民；《代下》八章十节，所罗门有二百五十督工底人，监管作工底民。

五百五十人与二百五十人不同。

《王上》九章二十八节，到了俄斐，从俄斐得了黄金四百二十他连得；《代下》八章十八节，到了俄斐，在那地方得了金子四百五十他连得。

四百二十他连得与四百五十他连得不同。

《王上》十章十六、十七节，所罗门用次金打造档牌二百面，每一档牌用金六百舍客勒，又用次金打造盾牌三百面，每一盾牌用金三弥那；《代下》九章十五、十六节，所罗门用金叶打造档牌二百面，每一档牌用金六百舍客勒，又用金叶打造盾牌三百面，每一盾牌用金三百舍客勒。

三弥那与三百舍客勒不同。

《王上》四章二十六节，所罗门有套车底马四万厩；又十章二

十六节，所罗门聚集战车和马兵，有车一千四百辆；《代下》一章十四节，所罗门聚集战车和马兵，有车一千四百辆；又九章二十五节，所罗门有四千处安顿马与战车。

一曰马四万厩，一曰车一千四百辆，一曰四千处安顿马与战车，可谓之同乎？

《代下》十三章三节，亚比雅用挑选底军兵四十万摆阵，都是有勇底战士，耶罗波安用挑选底勇士八十万向亚比雅摆阵；又十七节，亚比雅和他的军兵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仆倒死亡的壮士有五十万。

八十万其数固多，死去五十万，其数亦可惊。然此两节之四十万、八十万、五十万，拉丁本乃作四万、八万、五万也。

《王上》十五章三十三节，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雅底儿子巴沙在得撒作了以色列众人底王，作王二十四年；《代下》十六章一节，亚撒王第三十六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

巴沙于亚撒三年即位，作王二十四年，是巴沙之卒，在亚撒二十六年也。然何以亚撒三十六年，犹有巴沙之来攻乎，计是时巴沙已死去十一年矣。

《王下》八章二十五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作王；《王下》九章二十九节，这犹大王亚哈谢登基底时候，正是亚哈底儿子约兰第十一年。

十二与十一相差一年。

《王下》八章二十六节，亚哈谢作王底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